

◇浮沤堂读史

伍立扬

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



梁启超

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,议院选举法,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是败下阵来。

除文笔气势不如下,拥趸渐少,清廷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。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。

《胡汉民自传》说到1908年的论战,谈到《中兴报》,与保皇的《南洋总汇报》的对垒。“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。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。唯行文须至浅显,俾一般华侨认识耳。保皇派在星洲不敌,急至美洲请徐勤至。徐亦庸陋,非劲敌,稿数续,不能终篇,托他故去,保皇军既墨,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。”

改良派实际所从事,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。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,只不过他们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;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,又谋划暗杀李氏;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,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……康有为歧视孙中山,毋宁说是一种嫉妒,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。不劳而获,少劳而获,征诸现实,实现的几率太低。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,掉以轻心,勺大漏盆,眼大漏神,叫他去抓鬼,却被鬼抓去。从皇帝入手,建立宪政,期底于成,不能算错,但是揆诸现实,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不够。可惜,康有为是个成品,难以改变;而慈禧也是个成品,她的心性、欲望,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,别无他途。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惶奔逃,在那种压力下,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。保皇派既有先验偏执的思维方式,写起文章来,必然堕入魔道。

胡汉民认为梁启超读书剽窃别人的观点,自己下结论比较武断,所以前后不能自圆其说,认为自己流质善变,但是他又为什么发表革命言论呢,因为那段时间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论比较接近,敬佩中山,康有为知道后大骂一顿,派人和他谈,要求梁氏取消这种言论。但是后来梁启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门的会党反对他,他又说,我名义上是保皇,实际上是革命,总是反来复去。胡汉民认为梁启超写文章放纵大胆,工于八股,开阖取势,摇曳生姿,又夹杂好多汉语成语和东洋新名词,遣词造句像滚雪球一样。

梁启超因为能写时文而骄傲,他当时非常轻视学界,而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他结为立宪法团,有章宗祥、曹汝霖、陆宗舆等人,气焰嚣张,当时和他们辩论的《浙江潮》《江苏》等等,都没有打痛他们的,到了《民报》创刊时,梁启超就抵挡不住了,于是就造谣诋毁孙中山先生,说民生主义是为流氓和乞丐这样下流社会来设计的。

梁启超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问几乎是零,所需材料由他的助手提供,他也不懂日文,反正抄来抄去,强不知以为知,所以经过一段交锋,胜负立见,于是他就言不由衷地说,张之洞、袁世凯不是汉人吗?我把他当作寇仇,光绪皇帝不是满人吗?我爱戴他像爱天帝一样。胡汉民认为这是卑鄙又肉麻的言语。辩论的结果是《民报》全胜,《新民丛报》停刊,保皇派的旗帜至少在留学界已经倒地,后来章太炎出狱以后来到日本,胡汉民将编辑让给章太炎。

《民报》创办以后大家推胡汉民为编辑,有一次他去参加改良派追悼戊戌庚子烈士的大会,他登台演说长达三小时,举出康、梁保皇派的历史及谬误加以驳斥。他进一步说,反对革命者不应该利用死人欺骗活人,因此这个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常滑稽的。那一天,有一千多听众,大家疯狂拍手叫绝,康、梁以下的改良派都缩头缩脑不敢辩论,青年学生认为保皇是一种羞耻。

《民报》的序言是由中山先生口述而胡汉民执笔撰写的,很多文章都是这种方法由他和汪精卫两人执笔。

胡汉民的《排外与国际法》长达数万言,阐述民族革命的内涵。

中山先生说过:现有改变,皆赖革命之所赐。所以,不能以曾经的失败而否定革命的本质和意义。孙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民治、民有、民享的理想,成为中国人从此追求国家强盛和世界认同的一个宏伟目标,从另一角度视之,这或许比建立一个强权的军政府而让世人唾弃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辛亥革命后,全国各省纷纷响应,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,即各省约法。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,结合西方分权原则,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。

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,制定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。《临时约法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“主权在民”,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。因为,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,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,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——这才是所有改革、改良、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,而这种被称为“软实力”的价值再造,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,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。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中年奴

最近几年,有些80后喜欢自称“奴”。房贷缠身的人自称“房奴”,车贷缠身的自称“车奴”,为孩子的花销和教育而纠结的,自称“孩奴”。另有“卡奴”、“职场奴”之类。这样自称,当然不是乐在其中,而是满含反讽,还有点撒娇卖乖、叫苦连天的味道。其实有些本来就是他们到了岁数必须承担的,你奔波,谁不奔波?你累,谁不累?你养个孩子就“奴”了,你爹你妈养你时也不是没“奴”过。

早晚有一天,这帮悲催的“奴”们不再自称“奴”的。他们房贷还清了,车子换了大号的,在职场上混个一官半职,孩子也长大成人,不用再操心。这时行动坐卧不由自主春风得意起来。不见得是他们努力了多少,而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”的人类生活惯性。人到中年,功成名就,他们不再自称“奴”,开始试着自称“爷”。

而这时候,却是一个奴气最重的时候。外在的“奴”消失了,心灵的奴性亦百炼成器。一个最简单的判断:他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自称或自视为“爷”?因为他要把别人当“奴”。此为“中年奴”,或曰“中年奴性”。

中年奴的特征。技艺上或已成熟练工。油滑圆滑,游刃有余,灵性越来越少;经验越来越多,创造性、创造力越来越小。

物质上,似乎该有的都有了,没到手的紧赶慢赶也差不多了。本应更超然,却更困守于物质,以物质为后盾,一把票子砸过去,自认“人定胜天”。没了物质后盾,如丧考妣,惶恐不安,此正是严重依赖物质,不折不扣物质奴。

精神上,不再提理想。每日的奔波是真正为生活奔波,貌似脚踏实地,实则庸庸碌碌。哪个中年人提所谓理想,往往会被视作傻子。其实“理想”二字,并非虚妄,也非好高骛远。说大一点,乃是超越的魄力,广阔的视野。社会进步,生活更美好,都靠着理想推动。而中年奴们,不仅安于现状,躺在功劳簿上尿尿,同时更成为抑制社会前进的因素。他们不提理想,潜意识里也不希望别人提。记得当年崔健在长春开演唱会,他的拥趸们只能跟着唱《一无所有》、《花房姑娘》、《一块红布》这些老歌。崔健嬉笑怒骂,说:“不是我老了,是你们老了”。老崔一直在前进,他们跟不上了,反倒骂崔健老了。他们骂老人傻,骂更年轻的人傻,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。他们有话语权,有公权力。骂不过你可以揍你。

他们张张嘴谈崔健,号称喜欢罗大佑和李宗盛,只不过是拿他们怀旧,找乐子,不再是他们的同谋。他们担心既得利益消失,他们口口声声讨厌奴性,实质上已成为怂恿奴性、培养奴性、维护奴性的新势力。他们吹捧、说谎、迎来送往的技艺炉火纯青,也希望别人吹捧自己,毫不脸红说肉麻的话。

中年奴们,诚然还有生活的压力、家庭的责任、工作的负累。这些,在他们只是一方面。而他们享受生活、耗费资源的能力,也是非同寻常。多年媳妇熬成婆,可以大吃大喝,可以为所欲为,可以没人监督了,如同贾府的焦大当了主子,奴性大爆发,睡兽醒来,还真不容易控制。

中年奴,不仅是年龄问题,主要是心态问题、看待社会的角度问题。主导社会的是中年“人”还是中年“奴”,会波及并成为几十年后的现状。

了解中年奴,警惕中年奴,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吧。

◇岁月山河

欧阳文彬

在流亡和救亡中锻炼成长

1937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铭记在心的年份。

那一年,芦沟桥的炮声,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。

那一年,我十七岁,刚在南京读完中学,考取了苏州东吴大学,正准备升学深造,由于炮火的迅速蔓延,我随母亲流亡到长沙,东吴大学却从苏州迁到高淳,我自然无法前往,长沙的高等院校早已停止招生,我怀着读书救国的梦想,母亲也望女成才,想方设法让我插班进民办的群治农商学院。那时候,长沙经常受到日机轰炸,警报一响,人们就得往防空洞里钻,警报解除后,出了防空洞,往往会看到房屋被炸毁、不及躲避的人被炸伤亡的场面,有的横尸街头,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,惨不忍睹。我在群治学院读了不到两

个月,学校就被炸停课。十一月间北平民国学院迁到长沙,就地招生,又给了我一次上学的机会。

民国学院开学时间在十二月,已是一学期的中间了。招收来的大多是流亡学生,聘请的老师也大多是流亡到长沙的文化人,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,有的是进步知识分子。他们讲课的内容比较符合形势,贴近现实。历史学家吕振羽讲解社会发展规律,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。翦伯赞详细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。文学理论家谭不模讲文学概论,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社会,改造社会。小说家张天翼教文艺习作,教导我们创作要符合时代的需求,以抗战的利益为重,而且他以身作则,采取速写的形式,塑造了战争期间的典型人物。地下党员陈新(陈世德)通过教授世界语,引导学生走向社会,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在这些老师的教诲下,我的思想豁然开朗,在战争造成的苦难中,找到了努力的方向,仿佛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女,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当时,长沙经常有知名人士公开演讲,如战地记者陆诒就讲过抗战前线的情况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革命老人许特立的演讲,他是共产党的驻湘代表,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,他讲解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争十大纲领,既有说服力,又富鼓动性。他还提醒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,最后高呼口号:“抗战必胜,日本必败”,全场的群众同声呼应,群情激昂,令我热血沸腾。

许特立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,他的讲话让我听到了党的声音,树立了对党的信念,相信在党的领导下,抗日一定会胜利。

1938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,投入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我参加长沙文化界抗敌后援会,和文艺工作者们到医院慰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,还参加一致剧社宣传队,上街下乡,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刷标语,编壁报,唱救亡歌曲,演救亡活报剧,和许多流亡青年并肩作战。大家都是背井离乡,同仇敌忾,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一切为了抗战。有一次,演出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按照剧情的安排,有几个演员扮演观众,在卖艺老汉鞭打自己的女儿时,冲上前去夺他的鞭子。演到这里时,竟有观众自动冲出去抢夺老汉鞭子。群众的情绪也激励教育了我们。

当时的长沙,街头刷满了抗日标语和壁报,涌动着抗日救亡的热潮。

1938年秋冬,长沙吃紧,机关团体纷纷撤退,民国学院又要迁往湘西,我决定辍学。我因病未能及时撤离长沙,没想到十一月间,敌军未到,国民党当局就推行“焦土政策”,自己动手放火,烧毁了这座文化古城。我在大火燃起后仓促逃出,与携老扶幼的难民一起经历了一场特别艰苦的逃难历程。一路上,见到失散的孩子哭哭啼啼,找不到家人,一个年轻母亲已被炸身亡,不懂事的婴儿还捧着母亲的奶头吮吸。夜晚,只能找个破庙安身,用一些稻草铺在地上,甚至当被褥。真是今天不知明天会面临着什么困境。劫后余生,我向组织提出上前线杀敌的愿望,经过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,参加了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流动宣传队,成了一名专业的抗日宣传兵。

我们的任务是每星期走一个村庄,向农民宣传抗日。行军时,日晒雨淋,衣服湿透了,就靠身上的体温烘干。全队二十多人,只有一个铁锅,一个脸盆,一人生疮,很快传染给全队。所幸每到一处,都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,穷乡僻壤的老乡,有的甚至不知道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,他们表示日本鬼子要是敢来,肯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这使我们深信,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。

后来,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,我转到出版战线,为传播进步文化、播洒革命火种,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。

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,有不少在战火中牺牲了。我作为一个幸存者,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,活到了改革开放的盛世往事并不如烟,历史是不能忘却的。

◇成语重组

陈长林

悔之可矣

欧美商家爱拿顾客当上帝,本土上帝却常受商家气。网络购物本来省时又省力,不承想时观调包戏,一旦眼睛一眨——老母鸡变鸭,不知到哪儿说理去。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已正式进入二次修改程序,其中拟规定消费者非现场购物享有“后悔权”,如果商品不称心,可在指定日期内退货,且不用承担任何费用。信息传出,一石激起千层浪,买卖双方打嘴仗。

买家喜得“保护伞”,网购从此心放宽。由于非现场购物有局限性,往往给商家以次充好、以假乱真开方便之门,若无法法律撑腰,消费者只能哑巴吃黄连,无权反悔,无力反悔,无从反悔。而消费者享有“反悔权”,可以激活商业诚信法则,有助于创造诚信交易环境。

卖家高挂“免责牌”,下有对策先出台。“后悔权”刚刚传出意向,一些卖家已专设“买家必读”条款,对退货几乎一口否定。他们或诱导,或强制,让买家纵有后悔意,难使“后悔权”。所以如此,确有苦衷:有些产品如图书,看过就退难避免,还有药品、水果、化妆品等不宜退货,至于是否影响再次销售,“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”,由谁裁定,也是问题。 [图]